

南非社会权司法救济的方式评析

张雪莲

(东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南非宪法不仅明确规定社会权可以通过司法方式获得保护和实施,而且还赋予法院对社会权进行救济的广泛权力。宪法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社会权的救济方式做了一些探索,主要有宣告性判决、强制性指令和“读入”判决。这些救济方式对社会权的保护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因其局限性影响了救济的效果:一是过分关注集体利益而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二是对法院命令的执行缺乏有力的监督,常使法院命令流于形式,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因此,法院应承认社会权是个人权利,赋予社会权以实质的个人权利的内容,注重对个人权利的救济;并发展新的救济方式,对政府执行法院命令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

关键词:社会权;个人权利;救济方式

中图分类号: D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6951(2009) 03- 0165- 06

对于社会权诉讼,尤其是包含政府积极义务的社会权诉讼而言,问题的关键通常不是证明权利侵害的存在,而是为权利侵害建立起适当的、有效的救济。南非宪法赋予南非法院以广泛的救济权力,正是基于这些权力,法院对社会权的救济方式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其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汲取。

一、法院救济社会权的权力和方式

南非宪法不仅明确规定宪法权利可以通过司法方式获得保护和实施,而且还赋予法院对宪法权利进行救济的广泛的权力。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本条列举的人有权向主管法院宣称其权利法案中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或威胁,法院可以给予适当的救济,包括权利的宣告。”宪法第172条第1款规定:“法院在决定宪法问题时,可以发布任何公正和公平的指令。”从宪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法院救济权力的唯一限制是“公正和公平”的要求。在社会权领域,宪法救济条款赋予了法院广泛的救济权力,法院可以据此发展新的、适当的救济方法来满足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需要。“法院发布任何‘公正和公平’指令的权力为发展许多创造性的以补偿经济和

社会权利的救济铺平了道路。”^[1]

虽然我们不应把社会权与自由权做截然的区分,但是社会权诉讼确有一些不同于传统诉讼的特点,这就要求法院在处理社会权案件时发展和创造更有效的救济方式。社会权诉讼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诉讼的主体,二是侵害的性质。首先,社会权诉讼不仅涉及特定的个人的利益,也会涉及团体或一定阶层的人们的利益。这些人通常是穷人,依靠政府提供基本的社会经济服务,因此,他们对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积极义务的履行具有特殊的利益。此外,由于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不求助于法院,他们将无法获得这些基本服务^[2]。鉴于诉讼主体的这一特征,法院在为他们提供救济时除了要考虑特定个人的利益外,有时还要考虑整个受影响的群体的利益,要求国家为了整个受害者阶层的利益提供适当的救济服务。其次,从侵害的性质看,对社会权的侵害通常都是由长期的结构性剥夺造成的,这种侵害广泛而分散,很难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量化。因此,单纯的金钱赔偿将无法弥补受害人所受到的侵害,法院必须发展与这种侵害相适应的新的救济方式。

*收稿日期:2009- 01- 2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CFX010)。

作者简介:张雪莲(1975—),女,东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自从 1996 年宪法颁布后,南非宪法法院审理了四起典型的社会权案件。通过这些案件,法院对社会权的救济方式做了一些探索,主要有宣告性判决、强制性指令和“读入”判决。宣告性判决是当侵权行为发生时,法院就权利或法律问题所做出的判断。在 Grootboom 案^[3]中,法院宣称:宪法第 26 条(2)要求政府在其可利用的资源限度内制定和实施一项全面的、协调的计划以满足住房权的逐步实现;计划必须包含合理的措施,为那些没有土地、没有住房、生活在极端恶劣条件和危险状况下的人们提供救济;而政府现有的住房计划没有满足上述要求。从判决的内容可以看出,虽然宣告性判决可能对政府的资源利用有一些暗示,但是并没有为政府行为提出明确的指令。在随后发生的 TAC 案^[4]中,法院在救济的程度上比 Grootboom 案判决前进了一步。法院首先宣布政府采取的阻止 HIV 母婴传播的计划是不灵活的、不合理的,违反了宪法第 27 条规定的义务。接下来法院针对政府行为发布了强制性指令:要求政府无延迟地取消阻碍 nevirapine 使用的限制,向全国的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 nevirapine 并采取合理措施向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试验和咨询设施,以方便和加快 nevirapine 的使用,实现减少 HIV 母婴传播危险的目的。与前两个案件不同, Khosa 案^[5]争议的焦点不是政府社会保障计划的内容,而是保障计划适用的对象,即社会保障权的主体被限定为本国公民,而把定居在南非的永久居民排除在外。为了适应案件的需要、为受害人提供更有利的救济,法院在 Khosa 案中引入了“读入”判决,要求政府修订相关立法,把“永久居民”加在“公民”后面,使永久居民可以享受和公民一样的社会保障。

这些救济方式为促使政府履行其宪法义务提供了一个框架,能够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政策,重新考虑自己所承担的保护社会权的宪法义务。但是他们也因其对受害人个人权利保护的不利而备受质疑。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希望自己的权利能得到完全的、充分的救济,但法院现有的救济方式却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救济方式过分关注集体利益而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二是对法院命令的执行缺乏有力的监督,常使法院命令流于形式,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

二、过分强调救济方式的集体特征,忽视了个人权利的救济

南非宪法承认社会权是可以通过司法实施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就司法救济而言,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社会权是可以通过司法

方式实施的,还存在一个它是应当作为集体权利被实施,还是应当作为个人权利被实施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救济性质的定位和具体救济方式的选择。

(一) 现有救济方式的集体取向

是把社会权看做个人权利并为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提供救济,还是把社会权看做整个社会或某个群体的权利而为案件中暗示的所有人的利益提供救济?这是法院在处理社会权案件时必须做出的选择,宪法法院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宪法法院在它审理的第一起社会权案件 Soobramoney 案中,第一次阐明了它对社会权和权利救济的态度。虽然法院规避了集体的健康权与个人的健康权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冲突的问题,但是它坚持认为,在很多穷人很少或根本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基本健康医疗的情况下,为 Mr Soobramoney 提供昂贵的医疗是毫无意义的,无需为了某个特定个人的利益而牺牲社会整体的利益。基于同样的认识,在 Grootboom 案中,法院拒绝了原告提出的“宪法中的社会权为个人授予权利”的主张,拒绝承认宪法中存在可由个人主张的最低核心的物品和服务的权利。相反,法院把所有的个人的要求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需要的背景下,法院认为政府的义务仅仅是制定合理的计划以达到社会权的逐步实现。

从宪法法院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有的救济体系根本无法保证特定的诉讼当事人可以获得任何个人救济。法院已经承认当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即使诉讼当事人可能受到了特殊的侵害,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受到了侵害。如果必须要为这样的侵害提供救济,那么其目的不应仅是向受害人提供救济,也要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即使作为受害人的个人是可以识别的,即使对受害人个人的补偿是宪法诉讼的基本目的,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目的。法院还必须考虑在社会权保护中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以及它所采取的救济对被告方的影响。正是基于此,法院采取了一种“全面的”救济方法,将诉讼利益延伸到特定案件的当事人之外。

就南非宪法本身而言,多数社会权被表述为个人权利,如第 26 条(1)规定:“每个人有获得充足住房的权利。”第 27 条(1)规定:“每个人有获得健康医疗服务的权利。”第 28 条(1)(c)规定:“每个儿童有获得基本的营养、住房、基本的健康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权利。”那么,为什么宪法法院在实践中拒绝承认个人权利、拒绝为个人提供救济,而把目光投向了全社会或某个集体的利益?这或许可以从法院对社会权功能的理解和对资源不足的忧虑中得到一

些解释。

首先,南非宪法被认为是南非社会变革的工具,它承担了使南非社会从资源剥夺迈向资源平等分配的重任。南非宪法除了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外,也保证大量的社会权。“这些社会权既含有扩展个人利益的因素,也包含一些仅能为群体享有的利益,尤其是社会权中的那些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实现的因素。这种性质的义务要求政府为全社会或某个集体所有成员的利益提供物品或服务。”^[6]因此,社会权就成为宪法中体现其变革性质的核心内容,社会权不是个人的权利,社会权的救济应更多地考虑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其次,法院认为南非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允许社会权作为个人权利予以实施。虽然法院承认社会权的重要性,但是同时也强调社会权的重要性和意义必须放在南非的社会背景下来考虑。南非不仅面对着历史上种族隔离所造成的贫困,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如何减轻或消除贫困。大多数南非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是可利用的资源是不充足的,不足以为每个需要的人提供物品或服务。更重要的是,在社会权案件中,任何为案件中特定个人提供的救济都必然会对其他人或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例如,当个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获得某种药物,法院判决政府应当为他提供药物,那么有同样需要的其他人将无法获得这种药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权的实现要求资源的分配能使所有需要的人获益,法院应把注意力放在个人需要之外去考虑社会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个人权利必须在集体的福利下获得平衡。因此,法院认为采用一种超越个人的、“全面的”方法提供物品和服务,实现对社会权的救济是最可取的。

(二)法院应注重对个人权利的救济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正是个人,而不是团体,拥有食物、医疗、工作、社会保障、公正审判、出版自由、不受歧视等等的权利。”^[7]把社会权视为存在于社会层面或一般层面的权利的观点是对社会权的误解,是有害的。虽然南非宪法法院的策略部分是成功的,但是过分强调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必然会对个人权利构成限制或损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Groothoam案和TAC案的判决做出后,受害者并没有得到他们急需的住房和药品,他们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法院为他们提供的救济仅仅是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计划的期待,宪法赋予他们的社会权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实质的权利和实际的救济。在这些案件中,个人权利被淹没在更广泛的社会或集体利益中。但是,那些被社会权保护的利益

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社会权实质上是个人的权利。因为社会或集体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具有固有的尊严和价值,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主的个人,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同等的关心和尊重。作为社会权的主体,个人有权获得维持其有尊严的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而且,“在这些权利所确定的范围之内,个人拥有超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之上的合理的优先性”^[8]。因此,为了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而否定个人权利的做法是没有依据的。

此外,南非宪法法院拒绝把社会权作为个人权利予以救济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首先,我们不应否认宪法社会权,尤其是第26条和第27条包含的住房权和健康权,应服务于社会变革的目标,但是这并不妨碍社会权成为个人权利。相反,承认社会权是个人权利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救济正是南非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变革”不仅要消除由于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更重要的是宪法给了南非未来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承诺:要把南非建成一个建立在“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新的、更好的社会。而南非宪法之所以要规定大量的社会权,是因为一个人缺少基本的社会经济资源和服务会妨碍他成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同等有尊严”的人。社会权为“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等核心的宪法价值注入了实质的内容,它提醒我们: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诸如住房、食物等生存的必需品而被迫依靠他人时,他的尊严、平等和自由都将受到损害。因此,保护个人的社会权与社会权承担的社会变革的任务是一致的。而且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社会权不应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而应成为每个个人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其次,资源匮乏与否定个人的社会权、拒绝对个人权利给予救济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法院一再强调,在社会权案件中任何为案件中特定个人提供的救济都必然会对其他人或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利冲突的问题,而权利冲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不仅社会权之间会有权利的冲突,在自由权之间也同样存在权利冲突^[9]。只是与自由权相比,社会权对国家积极行为的依赖性更强一些,而资源匮乏又会使社会权的权利冲突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但这并不能成为拒绝对社会权作为个人权利进行救济的充分理由,除非法院也同样拒绝对自由权作为个人权利进行保护。

就社会权本身而言,资源匮乏确实增加了权利保护的难度,法院采取的“全面的”的救济方法也确

实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保护社会权的一种选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法院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实际上,法院完全可以既兼顾国内资源不足的现状,又为个人权利提供救济。在这方面,一种“以利益为基础”(interest-based)的方法或许能提供一些帮助,这种方法承认社会权保护个人的紧急程度不同的利益。如南非学者 David Bilchitz 认为社会权保护两类利益,一类是个人最基本、最紧急的生存利益;另一类是生存利益之外更宽泛的利益,它们的实现能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10]。这两种利益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紧急性,如果受害者不能得到立即的救济,他们就有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危险,因此这种利益必须得到优先考虑,它们构成了社会权的最低核心内容。对于这种最低核心层面的社会权,政府负有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立即予以实现的义务。“最低核心”的概念对于社会权的保护至关重要,一方面它能解决资源不足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因为保护社会权中最基本、最紧急的生存利益只需要使个人免受生存威胁的最低的基本资源即可。另一方面,最低核心的概念也使法院保护个人的社会权成为可能。因为一旦承认了社会权的最低核心内容,法院就可以依据它所提供的基准对政府行为进行审查,并在社会权最低核心内容的范围内为个人提供立即的救济,或者至少可以在政府的计划实施之前发布针对个人的临时救济命令。

三、拒绝发布监督命令,影响了救济的有效性

为了使社会权能真正实现,法院必须赋予宪法社会权以实质的个人权利的内容,并在它们被侵犯时提供有效的救济。有效的救济能增加实现权利的可能性,也能增加个人实际享有他们被赋予的利益的可能性。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将社会权视为个人权利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正如阿根廷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席 Victor Abramovich 所说的,从对社会权案件的分析中能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法院需要发展新的程序和救济规则来监督政府义务的履行^[11]。

(一)宪法法院监督命令的缺失

在社会权案件中,法院的命令通常会要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为权利的侵害提供救济,如修改现有计划或制定新的计划,提供目前没有提供的服务或把提供服务的范围扩展到目前不享有该项服务的人。而且,这类案件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针对大型公共机构,如学校系统、医疗卫生当局和公共住房当局等的指控,以及需要长期重构和监督的救济方式”^[12]。因此,为了保证自己的命令获得有效实施,法院必须决定它应当在多大

程度上对政府的行为、行为的范围和行为的方式发出直接的指令。

对法院而言,控制其命令实施的最明显的方法是发布结构性命令或监督命令(structural or supervisory interdicts)。这种命令通常要求政府为执行法院命令制定一项计划,并把计划提交法院和另一方当事人批准,然后定期向法院和另一方当事人报告计划的执行情况。对于政府执行法院命令的情况,法院可以自己进行监督,也可以通过诉讼的另一方进行监督,也可以由法院指定的监督者进行监督。实际上,法院的监督命令为政府履行其宪法义务提供了评判的依据。“监督命令是一个制定目标并监督目标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法院和市民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为市民社会和其他诉讼参加人提供了一个评价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机会。”^[13]发布监督命令必将有利于法院命令的有效执行,监督命令本身也构成了社会权独特的救济方式。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宪法法院对监督命令的使用一直持慎重态度。在 Grooboom 案中,好望角高等法院的判决包含了一项监督命令:几个被告应在判决做出后三个月内向法院提交关于判决执行情况的报告;原告应在上述报告提交后的一个月内对其做出评论;被告应在其后的两个星期内对原告的评论做出回应。但是宪法法院撤销了这一命令,仅发布了一个简单的宣告性命令,而把对住房计划缺陷的救济完全留给了政府。在 TAC 案中,原告向法院提出了发布监督命令的要求。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一是出于案件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即数以千计的儿童和母亲被感染;二是他们认为在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政府履行法院命令的程度和速度存在很大差别,履行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浮夸和缓慢的”^[14]。高等法院采纳了原告的主张发布了监督命令,“每个被告应在 2002 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报告,说明为了执行法院命令他已经做了什么、接下来将采取什么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时间安排”^[15]。宪法法院虽然承认它有权在适当的情况下发布监督命令以确保政府履行法院判决,但是它也表示它相信政府会履行法院判决:“政府总是尊重并执行法院的命令,没有理由相信在本案中它不会这样做。”^[16]因此,法院再一次放弃了监督命令。

但是事实并非如宪法法院所希望的那样,政府并没有严格履行宪法法院的判决。宪法法院在 Grooboom 案和 TAC 案中拒绝发布监督命令影响了法院命令的有效性,也使法院对受害人的救济大打折扣。受害人虽然赢得了诉讼,但是政府却做得很少。

实际上,法院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最终的政策决定权留给了政府,它的直接影响是受害人并没有得到法院判决允诺的住房或药物。Groothoom 案判决没有包含任何政府履行义务的时间框架,结果是数年后政府的住房政策仍然没有明显的变化。宪法法院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在 Modderlip 案的判决中,宪法法院指出:“政府已经忽略了 Groothoom 案的命令,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考虑处在住房危机中的人们的惨况。”^[17] TAC 案的判决虽然包含了对政府行为的直接指令,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法院命令在国家和各省层面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18]。

(二)法院的积极作用与救济的有效性

宪法法院拒绝发布监督命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法院对政府计划的监督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会使监督本身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使法院深陷于对复杂的政府政策的繁琐的管理之中,这是很多法院都不愿面对的。更重要的是,监督命令的使用可能会与权力分立和民主的原则相抵触,从而损害到法院的合法性。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在决定宪法问题,尤其是涉及社会权实施的问题时,法官被要求发挥复杂而困难的平衡功能:一方面,他们要考虑自身作为宪法保护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们也要考虑在制定政策和决定政府开支方面法院能介入政府其他分支领域的能力和程度。对于法院而言,社会权可能是它们涉足的最危险的领域,可能会被认为是不民主的,或者是对政府其他分支的权限的侵犯。而法院发布监督命令更加剧了社会权与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紧张关系,因为借助监督命令,法院不仅可以告诉政府做什么,而且可以对政府的具体计划和计划实施的具体方式施加影响。因此,法院在为社会权提供救济时要面对更多的实际困难,但是,法院不应因此而放弃对政府义务的监督。

首先,法院有责任保护社会权,并为此发展新的、有效的救济方式。一般来讲,当民主过程能保证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有效地履行宪法义务时,法院保护社会权的作用会很小。但是,一旦权利的实现被忽略,法院就有宪法上的义务促使其他政府分支履行其宪法义务。社会权的受害者通常是社会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人群,法院不应成为旁观者。在社会权的实施中,法院救济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案件进入诉讼阶段就意味着通过政治参与的民主程序来实现社会权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一旦受害人向法院宣称他们的社会权受到了侵犯,而且法院也认为侵犯确实存在,那么法院就必须为他们提供适当的、

有效的救济。这是宪法赋予法院的权力,同时也是法院承担的宪法义务。为了实现社会权的保护,法院有义务发展新的程序和救济规则来监督政府义务的履行。为此,法院需要比以前更多地介入立法和行政领域。

其次,虽然分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是重要的宪法原则,但它们并不是绝对的。权力分立“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保障人权的实现”^[19],而不应成为人权保障的障碍。同样,“民主制也须依附于权利,它的目标就是促进权利”^[20]。而且,尽管民主原则反对法院的积极作为,但是民主并不是宪法的唯一价值,南非宪法追求的“人的尊严、平等和自由”的核心价值也为法院发展新的救济方式提供了依据和指导。因此,法院发布监督命令、对社会权进行积极的救济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社会权的实现不仅与资源的多寡有关,更与资源的分配有关,不仅是一个物质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政府的政治决策对社会权的享有程度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政府可能会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而减少本可用于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资源、拒绝或迟延履行法院的判决。因此,当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无法或不愿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时,法院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保护社会权、为社会权提供有效救济的必然要求。如果法院不能采取积极措施监督政府义务的履行,宪法关于社会权的承诺就只能保持在消极权利的水平,法院也无法为它们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救济。

社会权的司法实施为理解权利和救济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崭新的视角。南非宪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它明确承认社会权是可以过司法实施的,这为社会权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但是,要使这些权利为穷人和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真正享有还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在救济方式的设计方面,法院必须要有更多的勇气和创新精神:承认社会权具有可以立即实现的最低核心内容,注重对个人社会权的救济;发展新的救济方式,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使社会权成为每个人都能主张、每个人都能享有的真正的个人权利。

参考文献:

- [1] A. 艾德, C. 克洛斯, A. 罗萨斯.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 [C].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 [2] W. Tregrove Judicial Remedies For Violations of Socio-Economic Rights ESR Review, Vol 1, No 4 (March 1999: 9
- [3]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and

- Others v. Grootboom and Others 2001(1) SALR 46 (CC).
- [4] Minister of Health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2002(5) SA 721(CC).
- [5] Khosa v. Minister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04 (6) SA 505(CC).
- [6] Christopher Mbazira “Enforcing socio- economic rights as individual rights The role of corrective and distributive forms of justice in determining” appropriate relief (2008) 9(1) ESR Review. 7
- [7] [8] [美] 杰克·唐纳利. 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 [M]. 王浦劬,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6 171
- [9] 龚向和. 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J]. 法律科学, 2005 (5).
- [10] D. Bilchitz Giving social economic rights teeth: The minimum core and its importance (2002) 118 South African Law Journal 484- 490
- [11] Center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 Litiga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2003. 61.
- [12] CF Sabel, WH Sino “Destabilisation rights How public law litigation succeeds” (2004) 117 Harvard Law Review. 1016- 1017.
- [13] Geoff Budlender “The role of courts in achiev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socio-economic rights”, (2007) 8(1) ESR Review. 11.
- [14] Mark Heywood “Contempt or compliance? The TAC case after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2003) 4(1) ESR Review. 8
- [15]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 v Minister of Health and others 2002(4) BCLR 356 (T), 129
- [16] Minister of Health v.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 and others 2002(10) BCLR 1033(CC).
- [17]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Land Affairs v Modderklip Boerdery (Pty) Ltd(CCT 20/04). 22
- [18] Mark Heywood “Contempt or compliance? The TAC case after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2003) 4(1) ESR Review. 8
- [19] 龚向和. 作为人权的社會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94
- [20] [美] L 亨金. 权利的时代 [M]. 信春鹰, 吴玉章, 李林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7. 139

责任编辑: 邵东华

Analysis on the ways of judicial relief for south Africa’ s

Zhang Xuelian

(Law School,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6)

Abstract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 not only explicitly regulates that social rights may be protected and accomplished in judicial ways but also grants the wurtwide rights to carry out judicial relief for social rights Constitutional court has made some expbration in the ways of relief in judicial practice, mainly including declaratory judgment, compulsory statement and “read in” judgment. These ways of relief have played certain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rights but limitation of these ways has affected the effect of relief. 1. More emphasis on collective interests than the protection of indiritual rights; 2. There is a lack of sufficient supervis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rt order which is often carried out in formality weakening the efficiency of relief. So, the court should admit social rights are part of individual rights, endow social rights with contents of individual rights, enhance the relief of individual rights, derebp new relief ways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supervision on government’ s implementation of court orders.

Key words social rights, individual rights, ways of relief